

代表委员热议: 农业供给侧改革如何发力

■本报记者 秦志伟 胡璇子 边慧

科学储粮应对粮食收储压力

●受访者:尚金锁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柏乡粮库主任

近年来,受国内粮食连年丰收、国家托市政策拉动、需求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粮食高产量、高收购量、高库存“三高叠加”现象突出,安全储粮形势较为严峻。

“从长远看,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础并不稳固,粮食安全还面临着很多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全国人大代表、河北柏乡粮库主任尚金锁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随着人口增加和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粮食消费需求将保持刚性增长,而我国人多地少水缺的基本国情将使粮食生产继续稳定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影响粮食安全的传统和非传统制约因素将日益凸显。

“丰收后的粮食往哪里去?‘连丰’带来的一系列粮食收储任务以及问题该如何应对?”尚金锁认为,科学储粮也是推进粮食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粮食供给侧改革,不光要把产量提上去,质量也要跟上去。”尚金锁说,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粮食等农产品供给和质量安全要得到更好保障,而这也是粮库职工心里一直坚持的——不但要让大家吃饱,更要让大家吃好。为此,柏乡粮库将创新融入了粮库管理的方方面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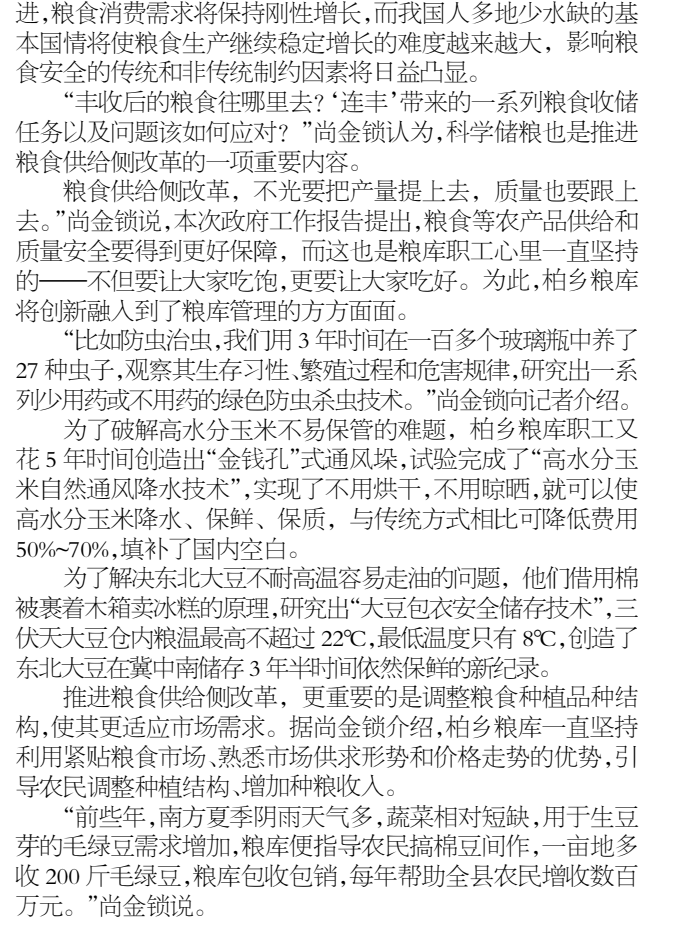
“比如防虫治虫,我们用3年时间在一百多个玻璃瓶中养了27种虫子,观察其生存习性、繁殖过程和危害规律,研究出一系列少用药或不用药的绿色防虫杀虫技术。”尚金锁向记者介绍。

为了破解高水分玉米不易保管的难题,柏乡粮库职工又花5年时间创造出“金钱孔”式通风垛,试验完成了“高水分玉米自然通风降水技术”,实现了不用烘干,不用晾晒,就可以使高水分玉米降水、保鲜、保质,与传统方式相比可降低费用50%~70%,填补了国内空白。

为了解决东北大豆不耐高温容易走油的问题,他们借用棉被裹着木箱卖冰糕的原理,研究出“大豆包衣安全储存技术”,三伏天大豆包衣内最高温度不超过22℃,最低温度只有8℃,创造了东北大豆在冀中南储存3年半时间依然鲜嫩的纪录。

推进粮食供给侧改革,更重要的是调整粮食种植品种结构,使其更适应市场需求。据尚金锁介绍,柏乡粮库一直坚持利用紧贴粮食市场、熟悉市场供求形势和价格走势的优势,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增加种粮收入。

“前些年,南方夏季阴雨天气多,蔬菜相对短缺,用于生豆芽的毛绿豆需求增加,粮库便指导农民搞棉豆间作,一亩地多收200斤毛绿豆,粮库包收包销,每年帮助全县农民增收数百万元。”尚金锁说。



农业支持政策要适时修订

●受访者:宋丰强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绿色中原现代农业集团董事长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条件和内在动力发生了深刻变化,突出表现在:主要农产品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但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农业生产面临农产品价格低、生产成本低、土地收益低、土地撂荒严重等问题。

在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绿色中原现代农业集团董事长宋丰强看来,这迫切需要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发展集约化、规模化经营。

宋丰强以河南省为例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道,作为农业大省,河南省农业短板更加突出,困难挑战更加艰巨,如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链条延伸不够,市场竞争力不强,土地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程度低等。“以上这些都是供给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

如今,河南省正处于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而对于全国而言,情况也是如此。

“可以说,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宋丰强表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不能完全延续过去的农业支持政策,必须对现有的农业支持政策进行有保有压、并作进一步修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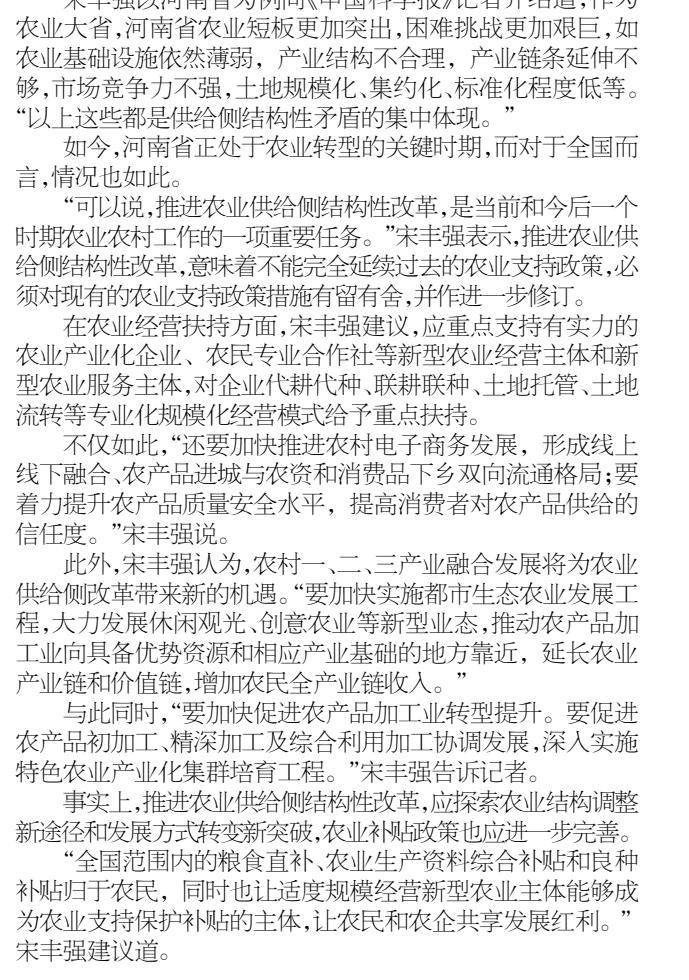
在农业经营扶持方面,宋丰强建议,应重点支持有实力的农业产业化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对企业代耕代种、联耕联种、土地托管、土地流转等专业化规模化经营给予重点扶持。

不仅如此,“还要加快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农产品进城与农资和消费品下乡双向流通格局;要着力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供给的信任度。”宋丰强说。

此外,宋丰强认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将为农业供给侧改革带来新的机遇。“要加快实施都市生态农业发展工程,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创意农业等新型业态,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向具备优势资源和相应产业基础的地方靠近,延长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增加农民全产业链收入。”

与此同时,“要加快促进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要促进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及综合利用加工协调发展,深入实施特色农业产业化集聚培育工程。”宋丰强告诉记者。

事实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探索农业结构调整新途径和发展方式转变新突破,农业补贴政策也应进一步完善。“全国范围内的粮食直补、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和良种补贴归并,同时让适度规模经营新型农业主体能够成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主体,让农民和企业共享发展红利。”宋丰强建议道。



当前中国农业面临着诸多矛盾和难题,这些“病根”主要出在我国农业结构和农业政策上。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深入农业领域,就要调整农业结构以提高农产品供给的有效性,增强农业资源在市场中的配置,推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破解中国农业发展困境。

满足市场需求 效率效益并重

●受访者:张令平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定西市委书记

甘肃省定西市是全国马铃薯三大主产区之一,近年来,定西市马铃薯总产量达到500多万吨,产业影响力由“中国马铃薯之乡”向“中国薯都”演变,功能效用由解决温饱跃升为支撑全市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优势产业。

全国人大代表、定西市市委书记张令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马铃薯作为主粮产品开发具有三大优势和特点:其一是品种的适种面积广;其二是产量高;其三是储存期长。张令平建议,将加快将马铃薯主粮产品产业化开发和推广写入相关的文件中。

定西市马铃薯产业的兴起是近年来甘肃省大力支持地方发展首位产业的缩影。“所谓首位产业,就是依托地方资源优势,发展自己的优势特色产业。”张令平表示,“像我们定西市,根据土壤、海拔、降雨量和平均气温等自然条件,就适宜种植中药材、马铃薯,适宜采取全膜双垄沟播的旱作农业技术提高它的产量和增加值。”

“我认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两个核心”,张令平说,“一是满足市场需求问题,二是效率和效益问题。”

以马铃薯的供给侧改革为例,首先要考虑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如何抓好马铃薯的种植,抓好马铃薯主粮化的开发,以满足人民群众对马铃薯作为主粮的要求。其次,马铃薯的种植在当地农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大,因此,要通过科学化布局、集约化种植、标准化生产、精深加工、品牌化营销等,将当地马铃薯的种植优势进一步扩大为经济优势和市场优势,为当地的扶贫攻坚提供有力支持。

“从我们的工作来说,就是把马铃薯、中药材种好,把它们产业链延伸好,通过科技创新提高产量、品质,进一步满足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提高农民的收入,为农民的脱贫致富和持续增收提供保障。”张令平说。

对于市场上出现的农产品季节性滞销的现象,张令平说,这主要是供求关系、市场信息不对称,农民对市场的估计不正确以及市场信号失灵等原因造成。“需要政府引导农民种植结构调整,多到田间地头提供市场信号和价格信息。”张令平建议,“另外,针对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应该建立农业保险。如中药材种植,我们已经开始试点,让农民有防范市场和灾害风险的意识。”



相关链接

农业供给侧改革官方怎么看

3月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农业部副部长韩长赋谈到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表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要重点抓三件事:

第一,调减玉米。现在粮食库存多,主要是玉米多。小麦是基本平衡,大米是平衡有余,主要是玉米多了一点,要推进粮改饲、粮豆轮作,甚至有些地方要推广轮作休耕试点,把非优势产区的玉米面积适当调减下来。

第二,增加大豆。我国是大豆原产地,我国的高蛋白大豆还是有优势的,做豆腐、生豆芽,还是自己的大豆好。但现在大豆不能满足国内需求,我国进口大豆是需要的,是难免的。要开展大豆品种攻关,还要提高大豆生产效益,包括产业链建设。

第三,提升牛奶。牛奶大家都很高兴,近年来我国的奶业得到长足发展,我国人均奶制品占有量从2000年的时候人均不到8公斤,提高到现在的近30公斤。十几年来,质量也在明显提升。而且90%以上是机械化挤奶,基本上没有挤奶姑娘了。婴幼儿奶粉奶源都是机械化挤奶,然后封闭的冷链运输,所以保证质量,保证安全。各项营养指标、奶牛品种、饲养质量也都在改善,所以现在奶制品营养和卫生指标也都符合国家的标准,有的是和世界标准接轨。

“总而言之,我们要推进供给侧改革使我们的农业生产更加符合市场、更加适应消费,更加提高效率,提高竞争力,使我们的生产和消费两端,使我们的农民和市民两方面都能够得到好处。”韩长赋说。(边慧整理)



科技创新补齐农业短板

●受访者:陈瑞爱
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受访者:王馨
全国人大代表、东莞市鼎盛鑫电子有限公司职工

“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突出一个‘变’字。因循守旧没有出路,只有创新改变,才能实现改革目标。”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农业大学教授陈瑞爱如是理解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陈瑞爱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作为当前整个经济社会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要求加大对政策支持、科技投入、模式创新等要素的支持力度。

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一个方向是补短板,即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等农业供给的薄弱环节,增加市场紧缺农产品的生产。

“农业尤其需要科技创新,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才能推出优良品种,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效率。”陈瑞爱表示,农业科技突破就是在“补短板”。“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科技支撑能力不足,农机装备水平相对较低,抗灾减灾能力不强,我国粮食安全远未达到高枕无忧的时刻,必须加快补上这些短板。”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东莞市鼎盛鑫电子有限公司职工王馨则建议,要加强农业基础性、前沿性科学研究,抓好生物技术特别是粮食作物优良品种培育,着力突破粮食生产的良种良法配套重大关键技术,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

而针对目前科技创新和粮食生产脱节问题,王馨建议,要加强农业科技基地与平台建设,以此为依托,组织实施重大自主创新项目,吸引和凝聚高水平人才,推动项目、基地、人才的有机结合。

“建立健全农业科研与高新技术开发、推广与生产应用相结合的管理机制。”王馨表示,改进和完善成果鉴定制度,以先进实用为评价导向,保证鉴定质量。

陈瑞爱也十分关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她认为,让科技工作者和团队的科研成果实现转化,能有效解放科研人员和提高科技生产率。有了成果,不是加工资,而是让成果转换成股份,让研发人员能不断地受益。科研成果转化为股份后,能形成一个长期性的、永久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平台与机制。

事实上,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上,目前我国还存在处置手续繁琐、定价方式不明确、技术入股风险较高等制约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等问题。王馨建议,应尽快建设全国性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交易平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要从市场定价,挂牌交易,同时提高职务成果转化个人或团队收益比例,该比例“不得低于70%,最高可达99%”。

“目前我国高校、研究所的科研成果转化率还不到30%,比如华南农业大学有很多具有推广潜力的农业新技术,但是由于转化渠道的不畅通,很难应用到田间地头,切实为农业增收、农民致富做贡献。”陈瑞爱认为,原来大学老师以文章为王,以后应以成果转化为王,产业为王,走出一条教学、科研与产业化相结合的新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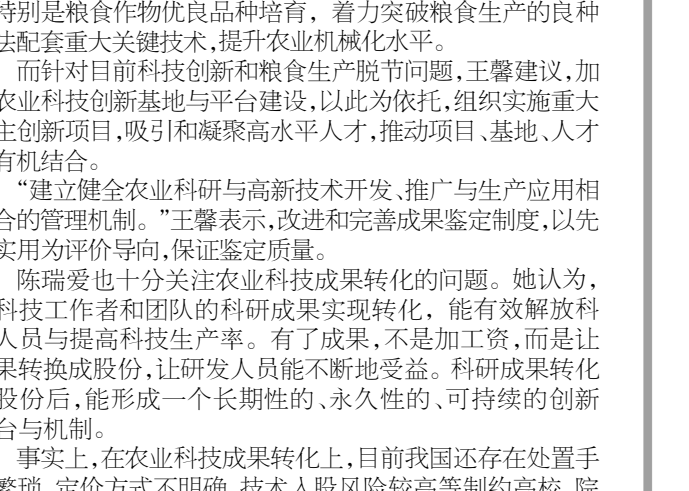
王鑫则将推进产学研相结合的目光投向了以培育农业实用人才为主的农业职业校。

“既具有农业科技研发基础,又具有成果推广的实践能力,可以向上对接科研院所与高校,甚至是农业科技企业的优秀科技成果;向下依托学校走向农村,同粮食生产经营主体合作,进行有关成果与种植技术推广。要发挥农业职业校优势,承上启下实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王馨说。

同时,王馨建议要完善科技特派员联动机制,加强科技特派员与高校科研院所、下派干部队伍、行业科技服务组织和行业协会等合作,整合农村科技推广资源,建立“宝塔型”农业科技传导网络,增强科技特派员的整体服务功能。

“长期以来,我国科技人才的创新动力得不到释放,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这在农业领域表现尤为明显。”陈瑞爱认为,要加快创新步伐,从个性化、高端化、品牌质量等方面提高农产品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实现供给和需求的“无缝链接”。

王馨认为,要继续加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财政扶持,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提供资金保障。陈瑞爱则建议,要破除创新政策落地难的障碍,尽快实现科技研发与市场需求的链接,让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动机。



精准扶贫“识贫”为先

“足寒伤心,民寒伤国。”贫困及其衍生出来的饥饿、疾病、社会冲突等一系列难题依然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我国也不例外。本届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要完成1000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任务”的目标,并强调坚持精准扶贫脱贫,因人因地施策。

两会上,代表委员们为“精准扶贫”开出了哪些药方?

精准扶贫,“识贫”为先

有人将“精准扶贫”比喻为“点穴式”扶贫,认为扶贫工作应像点穴治病,提高精准度,避免盲目性。

“点穴治病,识穴为先。”全国政协委员、河南中医药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中心主任司富春认为,识穴就像识穴,只有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摸清楚,才可能实现精准扶贫。

如何“识贫”?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给出的答案是:选择一个典型村作为抽样调查村,测算出特困系数,再按公式计算出农户贫困程度指数,同时建立贫困程度、返贫风险、措施评估三个指数,使精准识别工作更趋科学化、定量化。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认为,在做实帮扶力量时,也必须做到精准选,必须考虑驻村工作组是否有解决深度贫困这类“瓷器活”的“金刚钻”,需看他们是否能做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需看他们是否善做产业的谋划设计和推动实施。

“当前,只从政治方面要求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组还远远不够,还须考虑一些技术性因素。从贫困的多样性和扶贫的复杂性来看,组建专门的扶贫指导队伍,并让他们结合扶贫实际不断地探索、总结、推广更好的扶贫经验,可能是更有效的做法。”王海波建议,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技术人员应该是面向更广泛区域扶贫致富的“技术参谋”,乃至“技术司令”,而不是简单地去做一两个村的“阵地战士”。

司富春在调研中发现,因病致贫返贫,是农村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根据国务院扶贫办最新摸底的调查数据,目前全国7000多万贫困人口多数是农民,其中42%是因病致贫,涉及1200多个家庭。有些家庭即使暂时摆脱了贫困,也往往因为患病而再次返贫。”

因此,司富春此次带来了一个关于进一步有效推进医疗卫生精准扶贫的提案。司富春告诉记者,由于山高路远、看病困难,贫困群体患了小病隐疾往往能拖就拖、能扛就扛,一些原本能够及时治疗的疾病缓慢发展成重大疾病,长期得不到医治。

他提出,要加强统筹协调构建多层次有效的因病致贫返贫治理体系,进一步加强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商业健康保险等制度的衔接机制,加快实施农村分级诊疗模式,完善重大疾病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防止群众因“灾难性医疗支出”致贫返贫。

扶贫要形成“良性循环”

扶贫并不是包办“被扶者”的一切事务,满足“被扶者”的所有要求,而是帮助他们获得富起来的能力。

王海波认为,扶贫工作必须高度重视培养、打造或引进能带领农民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家。“产业扶贫,需遵循遵守产业发展的规律,普通农民大多难以适应。一些地方的农业合作社之所以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多是和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有关。”品牌打造、标准化生产、企业化管理,都需要有较高水平的企业家来完成,因此要特别注重对农村中有经营头脑、有大众情怀的年轻人才的挖掘,大专院校应把培养到农村创新创业的企业家列为重要的教育改革目标。

近年来,中西部地区有不少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形成了一股推动农村发展的新兴力量。农民工“回流”不仅带回了家乡缺乏的技术和市场信息,同时也推动了农村综合改革。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广元市委书记王菲认为,要发挥返乡农民工对城乡统筹的推进作用,需要政府引导、政策激励、产业支撑和技能培训等措施多管齐下,引导和鼓励农民工带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回乡。

“在扶贫工作中,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要做输血性的扶贫还是造血性的扶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副主任李蓝的问题发人深思。他提出,要促进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良性循环,把“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作为扶贫的新模式和方向,将生态扶贫做为精准扶贫的有益补充。

为此,他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总结贵州等地的生态扶贫经验,将其提炼成国家政策,正式向全国推广。并以精准扶贫思路为指导,在全国精心布点选点,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和西北干旱地区,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培育一批“生态扶贫”试点区和示范区,取得经验,向全社会推广。

“可以为生态扶贫地区的生态产品提供有国家信誉保证的‘生态产品认证书’,为生态产品顺利走向城镇和市场经济,开绿灯。”李蓝还建议,应制订市场优惠政策,打通生态产品与市场的流通环节。“只要物畅其流,货畅其流,再加上生态产品的品牌价值和规模效应,就会大幅度降低生态产品的价格,并在价格上形成比较优势,最终全面占领市场。”

「精准扶贫」咋实现

■本报记者 边慧